



## 对新时期改革开放问题的若干思考 —在中国体改研究会宏观经济座谈会上的发言

李罗力

刚才一些同志的发言给了我一些启发。我想概括地谈几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是现在提出的所谓“反对新自由主义”，这又是一次“沉渣泛起”，又是一次左的思想意识形态出来干扰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始终伴随着思想上的激烈交锋。每个时期，正确的思想路线都要与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路线进行斗争。尤其是左的思潮，打着维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根本路线的大旗，因此具有更大的危害性。而且改革开放每发展到一个新的时期，都会有左的思潮出来泛滥和阻碍。当人们冲破原有的左的思潮，推动改革开放达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时，左的思想又会出来阻碍。

现在，中国又进入了改革开放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去年发生的“郎顾之争”，挑起了有关国企产权改革的一场大论战。这次论战产生了以往不曾有的一个新特点，那就是大

量网民通过网络参与了这场大论战。以前思想交锋和理论争论，基本上都是发生在决策层面或者是理论界，一般的老百姓不了解、不关心也不参与。这次网民们的广泛参与，就给这场论战涂上了一层特殊的色彩，那就是对某种观点似乎形成了一种社会公众的广泛呼应。我觉得对此也不能不加分析地予以承认。例如在“郎顾之争”中，大多数网民都赞成郎咸平的观点，对不同意郎咸平观点的人痛批痛骂，甚至人身攻击。要看到，普通的老百姓与决策层及理论界有一个很大的区别，那就是他们总是从自身利益和相当局限的观察中来形成自己的观点，很难形成全局性的、长远的、有深度分析的思想和看法，而且也很容易受到一些偏激观点的挑动。这些对于老百姓来说，当然都无可非议，这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但对于决策层和理论界来说，则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清醒的头脑，正如毛主席所说，要做群众的先导，而不能成为群众的尾巴。总之，中国的改革进展到每个阶段都会有意识形态的激烈斗争，但是不管怎么争论，改革和开放是一定要往前走的。

第二个观点，这么多年大家一直都在讲改革，但是现在说来说去好象已经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了，我们是否能换一个新思路来考虑问题。

我提出的所谓“新思路”，那就是要把“改革”与“开放”这两者联系在一起思考，来分析中国的发展形势，来提出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所应当解决的问题。不能只谈改革，不讲开放，这是我的一个最深切的体会。我多次讲过，“开放”对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的作用绝不比“改革”低。我们现在所提到的改革中的难题、重点问题，如国企改革的问题、政府体制改革的问题、金融体制改革的问题、投融资体制改革的问题等等，实际上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就开始作为改革的重点和难点了，开始采取措施解决了，但是讲了 20 年，也做了 20 年，现在这些问题解决了吗？我看基本上没有解决，或者没有从根本

上得到解决，有些问题至今还没有破题，还有些方面甚至出现了倒退。但是，为什么中国经济还在大发展，社会还在大进步？中国为什么能够取得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为什么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现在很多人将此称为“中国经济之谜”，因为按照传统经济理论，已经无法解释中国的经济发展现象了，国外不少人认为，按照中国社会经济中长期存在的各种问题的严重性，经济早就应该崩溃了，至少会陷入很大的困境。但是现实是，中国的经济不但没有崩溃，没有陷入难以自拔的困境，而且还在迅猛发展。

我认为，要解开中国经济增长之谜，最有说服力的就是中国二十多年来在对外开放方面，取得了不但在中国历史上而且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前无古人的巨大成就，正是由于这一点，我们不但没有被自身存在的问题所束缚和打倒，相反争取到了更多的发展资源、发展动力和发展空间，从而导致了我们经济的大发展、国家的大发展和社会的大发展。

我认为，当前在我国的开放政策方面，在我国引进和利用外资方面，也出现了一股倒退的思潮。很多人在各种媒体上发表文章或言论，总体上的意思是，中国人在引进外资方面并没有占到多大好处，外国人把主要的利益都拿走了，我们只挣了一点加工费，我们吃亏了；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国经济有可能变成依赖外国的经济，会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

这些观点虽然看上去有一定道理，但在总体上是不对的，是站不住脚的。只讲一些重要的事实，比如家电生产，上世纪80年代我们引进的大都是日本、韩国的生产线，从表面看，确实是外国人把主要的利益都拿走了，我们好象吃亏了。但是现在情况怎么样，我们的家电产品不但基本上占领了国内绝大部分市场，把许多外国商品都赶出去了；而且还走出国门，开始占领国际市场，开始在国际市场上

与国外那些名牌产品展开竞争。很显然，如果没有早期的引进外资来生产家电产品，我国的家电产业完全靠走自己的路，绝不可能出现今天这个局面。另一方面，在家电产业引进外资并没有给我们的根本经济利益带来损害，并没有使我们的经济依赖外国，相反的是通过引进资金，也引进了技术、引进了管理、引进了现代生产和现代市场营销的理念、引进了学习和创新，从而大大提高了国内企业的生产能力、生产效率和国际竞争力。这不是理论给我们的解释，而是事实给我们的答案。我这里只举了家电产业的例子，实际上这种现象在我国众多产业都普遍存在，甚至从对整个经济运行各个层面来说都是如此。因此从中国经济的总体上说，引进和利用外资的利是远远大于弊的。我们付出的是暂时的和短期的利益，这是我们前进所必须付出的成本和代价，而我们得到的是长远的根本的利益，是国家的强盛和民族的振兴，是中国整体经济的迅速增长和大幅提升。

还有人认为我们现在已经接近“拉美化”的边缘，已经出现了过度依赖外资的危险。这种观点也是不对的。实际上我们与拉美国家在上个世纪 70 年代所搞的引进外资有本质的不同：我们是“出口导向”，他们是“进口替代”；我们是在生产领域引进外资，他们是在消费领域引进外资；我们引进外资是旨在利用外资来提升自己的能力，他们引进外资是旨在依赖外资解决本国经济的问题。

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实往往被人们忽略。引进外资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我国 20 多年来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所产生的大量就业问题。我曾经撰文指出，中国改革开放 20 多年，已经有一两亿农民脱离了土地和农村，进入了城市和工厂。根据有关资料统计，在这些离土离乡的农民工中，至少有 60 - 70% 都在外资（包括港台加工贸易企业）和为外资配套服务的企业（大多数是民营企业）中工作，很多江浙的民营经济、广东的民营经济都是直接或间接为

外资配套的。我在自己的文章中指出，这可以说是引进外资对中国改革开放所做出的最大贡献。我们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农业大国，要走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大量的失业人口，如果没有大量的就业岗位来吸收他们，那么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不但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而且还会给社会造成巨大的不稳定因素，造成整个社会基础的巨大破坏和断裂，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而在这20多年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国企是不断萎缩的，而民营经济又不可能那么迅速地成长起来，因此毫无疑问正是由于港台企业和其他外资企业的大量涌入，大量使用我国的廉价劳动力，才为我国新增就业人口解决了大量的工作岗位。引进和利用外资的这个重要的好处是我们绝对不能小视的。我还曾指出，大量内地的农民工进入东部沿海地区外资和民营企业打工，客观上也为解决贫富差距和地区差距带来了一定好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方面的社会矛盾。

另外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引进外资促进了我国的社会进步，促进了我国民主法制社会的不断形成和完善，促进了我国各级政府的转型，促进了我国劳动素质的普遍提高、管理水平的普遍提高、生产和经营技能的普遍提高，也促进了整个社会和整个民族的思想观念大解放。因此可以说，它对中国社会经济产生了深层次的、长远的、巨大的影响，这远远不是我们只拿了点工缴费的好处所能衡量的。

吴晓灵同志认为，我们现在采取和推行的很多体制改革措施和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外力倒逼的。我很赞成这个观点，我认为现在倒逼中国改革的有两股力量，一个是地方的自下而上的要求改革的力量，再一个是引进外资所带来的要求进一步开放、进一步改善软硬投资环境的力量。这两股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政府的转型、法制建设、民主社会进程等等。因此可以说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就是体现在不断的倒逼所引致的进步

上，这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一个重要特点。

第三个观点，现在有一股很不好的思潮，我把它叫做“妖魔化地方政府领导”。中国改革开放 20 多年的实践已经证明，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的诉求，对体制改革的诉求，对引进外资和对外开放的诉求，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巨大内在推动力。我觉得这是一个无论如何也不能抹煞的事实。我曾经撰文指出，中国改革开放形成大气候的真正的转折点是邓小平 1992 年南巡。它有两大作用，第一个作用是把开放政策和引进外资从局部地区一下子推广到全国；第二个作用是由于把深圳经济特区以及其他开放地区的经验推广到全国各地，对各地政府形成了极大的启示和示范作用。各地方政府都看到了这些开放地区通过敢闯敢干，通过改革开放，通过引进外资，经济大大地发展起来了，社会生活各方面也大大发展起来了，老百姓得到了实惠，地方政府的财政实力和运作空间也得到了大大的改善，因而极大地释放了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掀起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热潮，从而把中国经济发展推上了一个空前快速增长的快车道。尽管后来这些地方政府为自己局部地区的发展而竭尽全力地上项目上投资，不可避免地会引致全局的经济过热和宏观失控，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定的经济泡沫，而且中央政府也适时地正确地采取了宏观调控措施，严格控制资金、项目和土地，使经济得以平稳健康地发展，但是不可否认，小平九二南巡后所掀起的遍及全国的地方政府改革开放和发展的热潮，是中国经济能够发展到今天这样程度的主要推动力之一。

当然，现在许多对地方政府的批评中所指出的各种不正之风、各种不良现象和问题确实是大量存在的，在有些地方也是很严重的，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是我相信，中国大多数的地方政府及其领导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否则就不可能有今天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对地方政府及其领导的

投资冲动和发展冲动，也不能完全用“政绩工程”来诠释。一方面地方领导确实有“政绩”的驱动，这也是很正常的，谁为官一任不希望自己做得出色，能够得到上级的赏识和重视呢？但是另一方面他还有两个压力，一个是周围省区、周边地区快速发展对他形成的压力，另外一个是他所管辖的地区内老百姓对他的压力。他必须好好干，必须大干快上，否则他所领导的这个地方就要落后了，老百姓对他就会不满意了。所以我们要正确理解他们的“冲动”，不仅是为个人“评功摆好”的利益和愿望的驱动，更多的是来自下面和左邻右舍的压力。

还有一个方面也值得注意，就是地方政府的“政绩”冲动往往也是上面造成的。“上有好之，下必趋之”。关键是上面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地方政府及其领导的政绩和功过。过去主要是用GDP，那他们当然要追求上项目，追求扩张生产，追求经济发展速度，置由此引起的许多社会负效应而不顾。现在上面衡量的标准变了，是“和谐社会”，是“五个统筹”，是“绿色GDP”，那当然对地方的要求也不一样了，地方领导所表现出来的“政绩”冲动也与以前不一样了。总之不能出了问题，就把板子全打在地方政府身上，这肯定是不对的。

客观辩证地说，中国20多年的发展靠的是两个积极性，既有中央政府的积极性，又有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二者缺一不可。中央政府一方面要大力鼓励和推动地方继续改革和发展，另一方面还要正确适时地采取宏观调控措施，引导地区经济的良性发展，克服不良倾向。我认为现在中央政府的大政方针就是如此，例如振兴东北、开发西部、中部崛起的战略，就是在推动和鼓励地方发展；另一方面采取宏观调控措施，就是防止地方过度发展中所引致的宏观失控和局部过热。但是，采取宏观调控措施，并不等于中央要收权，要集权，要打压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从改革的根本方向上说，应当是中央政府逐步对地方政府放权，

地方政府逐步对社会中介组织放权，这个放权的过程，就是政府转型的过程。因此尽管现在中央政府主要采取宏观调控政策，但是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一定要保护，对地方政府的发展要求一定要做合理的分析，不能一概而论，不能“妖魔化”，不能一说经济过热了，宏观失控了，就说地方政府都是错的了。

第四个观点，中央还要继续坚持小平同志提出的搞经济特区的政策。建立经济特区是中国对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贡献，现在全世界许多国家都在搞经济特区，由于中国经济特区的成功，已经大大地突破了原有的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和保税区的概念，现在很多国家也都这样采取了类似我国建立特区的方法，就是划定某一个地区，实行不同于国内其他地区的政策，让它在某一个目标上发展，从而对整个国家的发展带来好处。作为中国来讲，经济特区是我们发明创造的，不应当我们自己反而不坚持了，取消了。

有人非常狭隘地理解经济特区的作用，认为现在全国普遍开放了，因此特区的作用已经消失了。甚至还有不少人把特区看作是寻租的产物，完全从负面来理解特区的地位和作用。这些观点实际上都是不正确的。经济特区的作用并没有消失，关键是看我们还要不要用它。因为它的最大作用，实际上就是改革开放“窗口”和“实验地”的作用。现在我们入世也好，政治体制改革也好，法制建设也好，与国际惯例接轨也好，都要在体制上、政策上出台许多新的东西，做出很多重大决策和改变，这些东西不可能在全国 13 亿人口 960 万平方公里上一下子推出，搞不好可能会引起很大的震荡甚至会产生严重的负面效应。因此一定还要继续做“实验”，要拿到一个小的地方去做实验，去与原有的东西、原有的制度接轨，在这个过程中，找出一个合适的方式，既符合我们的社会基础和政体基础，又符合新的改革方向和要求，符合国际规则和法制要求。实验



好了，然后再拿到全国其他地区去推广，这样可以大大提高改革开放的效率，避免由于考虑不周和措施不当所引发的风险，从而保证我国能够健康、有序、平稳、良性地持续发展。因此我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今后还需要做“实验”，还应该做“实验”，还需要保持改革开放的“窗口”和“实验地”。我们改革开放 20 年，搞经济特区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经验，我们不应该放弃。

第五个观点，用现代技术手段，用电子化的手段，尽量减少腐败的空间。这一点朱镕基总理也讲过。相对于其他体制改革措施和反腐败措施来说，这是相对比较容易地做到的。例如在政府招投标、审批、执法等方面，现代电子技术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操作平台和空间，可以大大增加政府工作的规范性，减少随意性；大大增加透明度和公开性，减少暗箱操作的空间。如果今后在政府工作的流程上，在政府的运行机制上，很明确和完善地规定哪些事情必须是要通过电脑进行的，那么它本身就是需要规范，需要透明的。尽管这种措施不是治本的措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的问题，但它对于政府的转型，对于减少腐败的空间，对于减少暗箱操作的空间，对于加强政府的透明度和公开性，都还是有很大的好处。关键是它是可以比较快地做到的，是相对比较容易操作的。

（作者根据录音进行了整理、补充和修改）

作者系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脑库快参》是综合开发研究院编印的一种内部参阅资料。

《脑库快参》的对象是社会精英和高品味的读者群：各级政府决策部门、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学者及海内外各类企业和机构的高层管理者。

《脑库快参》以重大政策和重大现实经济问题的分析研究为主要内容，同时选登国内外最新重要经济动态和信息，发表富有价值和启发性的评论文章。

《脑库快参》注重思想性、启发性和政策性，努力做到思想敏锐、观点鲜明和理论超前，同时坚持文字上的生动活泼和流畅可读。

《脑库快参》将不定期编印，每期一个主题，每篇文章三、五千字甚至更长一些不等。

《脑库快参》以综合开发研究院研究人员所撰写和摘编的稿件为主，同时也广泛欢迎社会各界及学者积极参与。

---

地址：深圳市银湖路金湖一街 CDI 大厦

邮编：518029

电话：0755-82487878、82471317

传真：0755-82410997

网址：<http://www.cdi.com.cn>

联系人： 郑宇劼 电邮：[zyj@cdi.com.cn](mailto:zyj@cdi.com.cn)

责任编辑：张朝中 电邮：[zhangchzh@cdi.com.cn](mailto:zhangchzh@cdi.com.cn)